

用心用情才能做实调查研究

——重温恩格斯《乌培河谷来信》

□ 陶 庆



《乌培河谷来信》是恩格斯于 1839 年 3—4 月期间，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匿名连载的作品，收录于 1956 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恩格斯基于在家乡乌培河谷的实地调查，在这篇文献中以社会风俗画形式描绘了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群体遭受的贫困与精神困境，给予工人群体深深同情。《乌培河谷来信》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重温这篇经典，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从调查研究出发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难道乌培河往山上流吗？”

1839 年，《德意志电讯》杂志连载了没有署名的系列报道《乌培河谷来信》，因作者运用细腻的观察和鲜明的判断，描述和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和一些宗教人士的蒙昧气息和虚伪做派，一下子在巴门和爱北斐特等地产生了强烈反响。这篇揭露资产阶级的通讯材料，与一些人当时所陶醉的中产阶级生产方式针锋相对。恩格斯当年仅 17 岁，应父亲要求来到父亲在巴门的公司当办事员，他在业余时间练习写作投稿，《乌培河谷来信》就是他的“试水”之作，这是他第一次从具有调查研究性质的观察与分析中得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当时的纽伦堡杂志《雅典神殿，科学、艺术和生活》对《乌培河谷来信》刊出好评：“今年 3 月份的几期《电讯》十分忠实地描写了爱北斐特和巴门的宗教方面的情况；作者用寥寥几笔生动地勾画出克鲁马赫尔的特点。”但是，持保守立场的《爱北斐特日报》编辑马丁·龙克尔于次月 12 日在该报撰文批

稿，对恩格斯观察到的事实和其立场展开抨击。恩格斯面对这种罔顾事实的批评，驳斥道：“乌培河谷来信”是通过作者自己的亲身调查，根据真材实料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陈述和科学分析。他指出，“我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住过，并且具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察各阶层的生活”。

通过《乌培河谷来信》可以看到，青年恩格斯已经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对所观察事物拥有“发言权”的最有力支撑。他对那种没有经过实地调查就凭空指手画脚、信口开河的教条主义者，以及迷恋宗教信条“引经据典”的唯心主义者，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我也不想说，红色的乌培河在巴门附近又变得清澈了。这毕竟是无稽之谈：难道乌培河往山上流吗？”

下层阶级“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

通过自己的观察，恩格斯积累了翔实资料，对乌培河谷地区普通人民的生活、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情况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录，深刻揭示出该地区的问题所在。他批判了当时在这些区域存在着的诸如“虔诚主义”的观念，借此表达了对当地人民饱受资本家工厂主长期压迫，以致生活艰难困苦之深深同情。

恩格斯指出，当地的工人生存压力巨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并且，工人们工作的环境十分的糟糕，“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除了糟糕的工作环境，当地工人因为受着工厂主长期的压迫，工资收入十分有限，所以普遍都很贫穷，“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样的情况，使得当地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但工厂主仍旧“千方百计降低工人

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

恩格斯对这些工人的境况进行了细致观察，记录下他们的痛苦和不幸：“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恩格斯进一步揭露了工人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并不是被有产阶级所污称的“品质”低劣。相反，恩格斯用事实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恩格斯还联想到，这个区域的贫困人口自身得不到一点人生幸福，他们的孩子自然也就沦为了资本家盘剥的对象，“2500 个学龄儿童就有 1200 个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

青年时期的恩格斯饱含着对工人群体的深厚感情，对他们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同情，这在他的这份研究报告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浸没在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的海洋里”

通过调查研究，恩格斯当时观察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大部分普通群众没有沉沦堕落的社会生活中觉醒，普遍处在保守愚昧观念的精神麻痹状态。这种社会现象不仅激发了青年恩格斯对当地普遍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中的群众的同情，还更加引发了他对统治乌培河谷群众的精神上的“贫困”——传统观念和保守愚昧思想的密切关注。他指出，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当地工人普遍的物质上的贫困，还十分严重地限制了当地人们精神上的思想解放。“如果有一个传教士是个有名的唯理论者（他们这样称呼每一个哪怕和他们有一点点意见分歧的人），那他就得得不到安宁。”

恩格斯通过近距离观察，对虔诚主义影响下人们颓废沮丧的真实情况进行了细致观察：“谁要真想了解一下这种

人，谁就应当到一个虔诚派教徒的作坊——铁铺或鞋铺——里去看一看。一个师傅坐在那里，右边摆着一本圣经，左边——至少经常是——放着一瓶烧酒。在那里，工作是不会妨碍他的。他几乎总是在念圣经，时而喝上一盅，偶尔也跟帮工一起唱圣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当地教育与这种虔诚主义流行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虔诚主义者在思想和精神上麻醉当地群众的危害，“不言而喻，既然虔诚主义在一个地区这样流行，那末这种虔诚主义精神就必然会散布到一切领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断送他们。受这种精神影响的主要是教育事业，首先是国民学校。有一部分国民学校完全掌握在虔诚派手里”。

恩格斯通过列举当地学校教育、教会教育等分布，以及教学老师来源、学生构成和学习状况等情况，展开深入分析，对乌培河谷地区开始流行的弥漫着虔诚主义元素的文学社团活动给予了严正的批判。“这就是著名的乌培河谷在文学方面的全部情况。或许还应该加上几个由于酒的刺激而兴奋起来的和常常用些蹩脚的诗来检验自己力量的伟大天才”，“这块地方全都浸没在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的海洋里”。年轻的恩格斯饱含着对当地民众的关切，通过自己的调查深刻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抨击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些调查也激起了青年恩格斯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作斗争的愿望。

可以看到，如果没有长期亲身经历的观察和分析，没有对当地社区民众的深厚情感，就不可能完成具有实事求是的客观科学品质的《乌培河谷来信》。恩格斯自己也在之后感叹过：“不久前我重读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风格大为惊讶。自那时以来我再没有写出这样好的文章。”

《乌培河谷来信》发表已有 186 年，但对于我们今天改进调查研究仍然有所启发。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像恩格斯在乌培河谷实地考察、分析问题那样，用好用活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用心用情做实调查研究，推动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读〔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 邓峰云

保罗·肯尼迪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曾撰写和编辑过多本国际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大国的兴衰》最为知名。该书对公元 1500 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它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各国在军事与经济领域的综合地位变迁，强调了经济军事平衡对大国兴衰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作者以这一视角还分析了中国的历史演变，从一个宏大视野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

从“停滞”到“复兴”

肯尼迪认为，大国的兴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每个大国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和衰落轨迹。他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国兴衰，揭示了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临的挑战。在他看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

公元 1500 年前后，中国是当时世界舞台上的“中心”之一，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庞大的经济体量，经济、文化和科技均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对全球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中国当时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上逐渐滞后，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面对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国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及清政

府内部腐败的加剧，加上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重创，逐渐失去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肯尼迪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沉沦与复兴交织的篇章。19 世纪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直面西方列强的挑战与侵犯。此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内乱和外部压迫，直至 20 世纪中叶才逐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与独立。20 世纪的后 20 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开启了快速复兴之路，为 21 世纪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全球格局。

中国的战略地位具有天然的复杂性

在肯尼迪看来，中国踏上复兴之路并非坦途，其战略地位具有天然的复杂性。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周边国家众多，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克服地缘复杂条件的关键在于其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在书中，肯尼迪的核心论点之一便是：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这一论断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了生动验证。中国政府通过实施深刻的内部改革，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等举措，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飞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

此同时，对外开放战略同样至关重要。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体系。肯尼迪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的壮大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新现实。

除了经济力量，肯尼迪还强调了文化底蕴在支撑国家地位和塑造发展路径中的深远作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而不同的秩序理念、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这些文化精髓，经过不断地创新发展，能够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撑。因此，中国的复兴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也是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过程。

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强

肯尼迪在书中指出，地缘政治重要性和军事实力始终是经济实力的产物，而经济实力始终处于变化中。“主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实力并非恒久不变”，这主要源于不同社会的增长速度差异，以及技术和组织突破带来的相对优势变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的多极化演进，其本质是权力分布与规则制定权的再分配过程。这种转变体现在东亚经济纵深的持续拓展，也反映在技术革命对传统霸权优势的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权力坐标的位移并不是

一国取代一国的简单线性替代，而是呈现出多维度交织的复杂图景：既有经济重心的东移趋势，也有科技创新引发的规则重构，更有文明对话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这样的世界变局中，中国展现出它的实力与韧性，成为重塑全球格局的重要力量。

肯尼迪认为，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毋庸置疑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制度支撑。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人道救援等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努力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肯尼迪预言，中国将能够跨越世界历史上的兴衰周期，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为自身和世界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耶路撒冷是一座神奇的城市，也是国际问题研究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人们接触到的有关耶路撒冷的著述大多是一些学术化的解读，聚焦宗教或族群。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耶路撒冷：一部传记》以拟人的口吻追溯耶路撒冷的历史，呈现了一个神圣与世俗交织、美好与丑恶并存的迷幻世界。这既是一本冲撞心灵、引发思考的历史学大众读物，也是一部高潮迭起、朗朗上口的文学作品。该书出版以后，风靡英国，进而畅销全球 30 多个国家。塞基格曾说：“作者深刻的研究加上其栩栩如生的表达天赋，使得这本书无论是对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将如获珍宝。”2014 年，该书的中文版本《耶路撒冷三千年》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推出，至今仍有着巨大的读者群。

《耶路撒冷三千年》把耶路撒冷城人格化，着力展现其历史独特性。蒙蒂菲奥里创作这个作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真正了解这座“两个国家的首都”“三种宗教的圣地”。他写道，耶路撒冷的历史是属于整个世界的历史，它同时也是犹地亚山间一个贫瘠小镇的编年史。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之中心，而如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名副其实：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系宗教之间的斗争焦点，是不同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对峙的前沿阵地，是 24 小时新闻时代里世界摄像机聚焦的“舞台”。“宗教、政治和媒体兴趣相互交错，使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集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耶路撒冷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仅因为它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圣地，更源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无休无止的争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视耶路撒冷为不可失去之城。蒙蒂菲奥里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历史资料，吸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了传记史、编年史、考据学的方法，以史实分析与大众言说相结合的表达手段，比较详细地呈现了耶路撒冷上演的大国之间的势力博弈、三大宗教之间的溯源与纷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而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耶路撒冷的历史命运，关系到中东这座“世界火药库”的平衡与安宁，从而牵动着整个世界的敏感神经。

在尊重史学传统的前提下，蒙蒂菲奥里以流畅优美的语言搭建了一个广大的舞台，让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登场：有亚伯拉罕、耶稣、穆罕默德；有国王、皇后、诗人、圣贤、征服者。从所罗门王、大卫王、萨拉丁、苏莱曼大帝、克娄巴特拉、尼布甲尼撒、希律王、尼禄到近代的德皇、迪斯累里、马克·吐温、林肯、阿拉伯的劳伦斯及丘吉尔等。除此之外，他的目光还对准了普通的男人、女人，有农民、匠人、罪犯等。一个个逼真的人物形象刻画了耶路撒冷的两面性——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这种悖论性表象使耶路撒冷叙事总是起伏跌宕、喜怒无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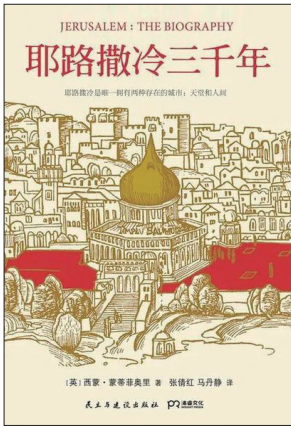
在《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蒙蒂菲奥里描写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情感与宗教习俗。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位英国犹太人，他能够直面历史、肯定巴勒斯坦人的权益。正如他所言，“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话间进行裁决”，“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的多元性”。蒙蒂菲奥里强调，耶路撒冷是一个拥有“天国”和“人间”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而“地上之城的绝美无双与天上之城的光辉荣耀相比，又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许多人声称耶路撒冷只属于他们，但实际上它属于所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三千年的历史

这座城市何以牵动世界的敏感神经

——读《耶路撒冷三千年》

□ 张倩红



▲ 《耶路撒冷三千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进程中，宗教之争、民族之争、文化之争、地缘之争不断。在反复穿梭了历史空间之后，蒙蒂菲奥里在书的结尾处揭示了耶路撒冷的现代困境与政治僵局，激起了人们对其前途与命运的关切与期待。蒙蒂菲奥里虽然无力为这一世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但尝试用自己的逻辑与推理，引导读者去反思灾难、鞭答罪恶、控诉欲望、批判极端、呼唤理性。

《耶路撒冷三千年》之所以广受关注，在于它带着浓烈的情感，以细腻的笔锋再现了世界宗教之城的宏大叙事，启迪人们尊重历史真实、先贤教诲、他者情感以及内心的召唤，并以此为基础去化解心结、追寻包容、实现共生。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耶路撒冷三千年》可以为中国读者打开一扇理解中东的窗户，启发我们带着中国智慧去感知异域文化、领悟人性之本、思考世界难题。

（作者系郑州大学原副校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